



在信仰与功利间跳动的舞者

文 / 李真真*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北京 100190

【关键词】 社会文化, 科学文化, 信仰, 功利, 舞者

DOI 10.3969/j.issn.1000-3045.2012.01.015



李约瑟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被称之为“李约瑟之谜”,其隐喻了多个深层问题,其中之一即是:怎样的社会文化孕育了现代科学?这个问题将社会文化与现代科学的起源紧密联系起来。实际上,此类话题也早为科学社会学所关注,罗伯特·默顿对科学的早期研究即揭示了这样一个命题,通俗地讲即是:有什么样的社会文化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科学。如果说默顿将科学置于大的社会背景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那么伯纳德·巴伯关于不同文化价值与社会结构对科学命运的影响的研究,则在方法论上做出了具有经典意义的贡献。显然,默顿命题为我们探讨或理解20世纪以来中国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视角。

发端于西方的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时的中国,民族救亡与文化救亡的燃眉之急成为中

国人吸纳西方科学、推进科学本土化的直接原因或主要动力。现代科学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承载着双重救亡之重托,从而使科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呈现出了特有的二元结构:一方面,科学作为整合人心之精神资源被信仰化;另一方面,科学作为立国之本之物化工具被功利化。纵观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历史,在中国,科学之辉煌,在于它被当作一种现代化动力、原则和价值尺度而被社会所普遍认同;科学之沉重,在于它被置于以现代化名义推进的社会转型中成为被改造的对象,从而使科学的价值尺度迷失于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价值之中。可以说,20世纪以来的中国科学就如同一个在信仰与功利间跳动的舞者。

毋庸置疑,追求科学的功利价值是后发国家的共同特点。但是,与大多数后发国家只把科学当作国家功利目的之工具的情境不同,中国知识分子在充分肯定科学在实现国家目标方面的意义的同时,还对科学文化进行了广泛和独立的哲学反思。然而,深入探究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哲学反思或文化

*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所研究员。E-mail:lzz@casipm.ac.cn

修改稿收到日期:2012年1月5日

努力,其目的同样在于寻求国家精神整合、价值整合的意识形态工具,它不过是科学救国、立国、兴国在另一个层面上的追求和抱负。在这种情境下,科学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起来。这种社会的价值取向不仅形成了中国人对知识的特殊的价值观,而且制度化的科学从一开始即以立国、强国的社会预期为取向而植根于中华,正由于此,国家对科学的介入,不仅仅来自于一般后发国家所强调的资源集中使用的规模效益,而且具有一种社会文化价值资源的支持。

科学与国家利益间的紧密联系导源于20世纪初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情境,并且在此后近一个世纪的立国、兴国、强国的不懈努力中不断地被强化,成为科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科学的意识形态下,科学研究与国家目标间的联系在不同时期被置于不同的政策概念下展现出来,无论是50—60年代的“理论联系实际”,80—90年代的科学与经济的“面向与依靠”关系,还是当前的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等等,无不体现出了我国特有的科学文化与精神气质。具体讲,在科学研究与国家目标的关系框架下,科学被赋予了“政治”和“发展”两种涵义或双重指向。

建立科学研究与国家目标的紧密联系,通过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特定的科研机构 and 研发领

域,的确为国家发展带来了诸多好处。但是,内化于科学的双重指向也使得我国科学的发展常常处于左右摇摆的境地,尤其当政治指向与发展指向不一致甚至发生冲突时,这一情景就更加不可避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生于我国不同发展时期的有关基础研究的争论即是其中的典型案例。显然,导致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就在于,建立在科学研究与国家目标相联系基础上的科技体制,政府部门所具有的“国家代理人”身份,使得科学的议程设定成为一种由政府主导的活动。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科技计划来决定科研经费的分配,并且通过科技评价将对科学的政治期望转化为对科研机构及人员的产出压力。

“落后就要挨打”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这一概念映射到科学,曾如此强烈地转化为社会对科学的期望。在这里,科学代表了一种进步的社会信念或文化价值。在这个信念框架下,科学作为一种中国现代化动力和价值尺度而获得至尊的地位,同时,科学所体现的实现国家目标的实用或功利价值而使其成为以社会回报来体现自身价值的工具。但无论怎样,迄今为止,历史赋予的使命与重托仍然是中国科学挥之不去的情怀。然而,在中国科学发展的今天,也许我们需要给予科学以更深刻的反思,给予科学以更大的人文关怀。